



发怵，“宣传工作，又要大张旗鼓、热热闹闹，还得谨小慎微、不出丁点差错，这活儿，扎手。”他形容自己当时颇有一种“猪八戒抱刺猬”的感觉。

大明星索菲亚·罗兰来上海，安排记者前去接机采访，百里挑一定下了名单，谁知办公室里突然闯进来一位年轻人——“他一进门就扑通跪地，像捣蒜一样对着我磕头，‘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’。我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，只好说：‘起来！我答应你。’”话音刚落，他一咕噜爬了起来，告诉我，自己是台湾来的媒体，来之前报社领导说了，如果竞争对手采访到的新闻他没有采访到，回去就被炒鱿鱼。眼看着同样来自台湾的竞争对手已经坐上了前往机场的大巴，他急了。”

最终，许朋乐为他争取到了一个额外名额。而这只是他日常繁琐工作中的一段小小插曲。真正的重头戏，是编印电影节会刊和《每日新闻》。“首届电影节就向国外看齐，不但想尽办法搜集海外电影资料编撰了几百页的会刊，还同样每天出版《每日新闻》——我记得是每天2个印张32页，8页彩色，24页黑白，中英文对照。”

当时新闻委员会只有十来个人，《每日新闻》每晚10点截稿，再开始着手英文翻译、排版、送印刷厂出样、校对、付印……等2000多份《每日新闻》印好，许朋乐还要进行最终检查，没错才能送到各代表团下榻的酒店、各位中外记者的邮箱。每天这套动作忙完，往往已是清晨了。睡上两三个小时，又要开始一天全新的采编工作。果真是天天“身披一道朝霞”。

“你大概不知道什么是‘照相排版’吧？”许朋乐笑说，“那会儿我们的编排印刷手段真叫落后——内容版式确定后，图片要扫描，文字需通过照相翻印在相纸上，再根据版式样稿剪贴，然后制版进入印刷。程序复杂，费时耗力，每天晚上，新落成的影城四楼大会议室里，一群人围立在会议桌旁，找的找，剪的剪，贴的贴，忙得不亦乐乎。有时剪刀下歪了点，一行或一个字就不见了，几个人趴在地毯上，瞪大眼睛昏昏晃晃寻个遍。幸好那时还年轻，腿脚还算灵活，换成现在，爬几次就能浑身散架。”

他至今仍然感谢一位名叫玛利的电影节新闻部志愿者：“她来自加拿大，在上海念的研究生，中英文都很流利。为《每日新闻》当英文编辑，那工作真叫一个忘我，常常到下半夜甚至清晨才回住处，还发生过小区大门已关、只得翻墙回家的故事。我叫她‘电影节的白求恩小姐’，饭都不吃，就喝自己买的咖啡。当时央视《生活空间》栏目来电影节蹲点，也拍到了她的敬业奉献。”

8天里，重要来宾的一举一动都没有逃过《每日新闻》的法眼。“好不容易中国有了这样的平台，国内创作人希望过来宣传自己的影片，国外也有好莱坞电影公司的编剧、明星希望借此宝地扩大影响，发布会是最热闹了，在银星假日酒店四楼的‘银星厅’，每天都有好几场。

而面向记者的新闻发布会就安排在影城的地下一层，现在那里变成上海影城B1的‘城市超市’了。”

白求恩小姐不吃饭，其实许朋乐也顾不上吃饭。他那会儿吃的最多的，是八宝粥、火腿肠，不仅因为吃起来方便快捷，还因为这些其实都是电影节赞助商送的，属于有啥吃啥，顾不上挑。“电影节办公室主任江平还给我送来一大箱当时市面上流行的保健品，叫‘活力OK’，说是可以提神醒脑，祛乏消累。我加班加点连轴转，每天要喝上十支，效果堪称神奇，一连数月，竟然不困不累，始终像个充满气的皮球，到处蹦蹦跳跳。可是电影节结束，我喝下一大箱‘活力OK’后才发现，其他同事都瘦了，唯独我重了好几斤。这才想到，大概是被活力饮料里的激素给‘激’中了。”

再忆首届电影节，许朋乐最感慨的是，他“亲身见证了中国没有电影节的历史是如何被终结”：“每个人都憋着一股劲，没有条件创造条件，也一定要把电影节给办好办成”。

## 王佳彦：1斤10排，评委专属席位

这几天，“四眼老王”王佳彦还在忙着给影迷安排加场——他原是上海影城经理，退休以后，成了上海国际电影节的御用排片师，



他一进门就扑通跪地，像捣蒜一样对着我磕头，“你不答应，我就不起来”。

